

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审视与超越

刘海健¹, 范艳萍²

(1.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作为福柯的成熟之作《规训与惩罚》通过对监狱制度诞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示了“规训社会”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断裂和偶然, 福柯以谱系学的方法生动而真实地揭示出“权力—知识”关系何以成为人类肉体(身体)的牢笼, 而人类又何以对此浑然不觉。主体化似乎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命运, 而晚期的福柯又通过其关切自身的伦理学(生存美学)超越形塑主体的权力与知识。

关键词: 知识; 权力; 身体; 谱系学; 主体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4-0047-04

福柯早期和晚年的著作虽侧重点不同, 却一以贯之地关心着主体的问题。从“知识考古学”^[1]到“权力谱系学”, 再到晚年“生存美学”或“自我技术”的转向, 福柯前后 3 种略有差异的分析策略贯穿了福柯剖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方向——探索现代社会中主体的形构过程, 即主体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福柯并没有从启蒙和形而上学规划的叙事范围内解析主体化过程, 对被人们奉为主臬的“启蒙精神”持有一种“审慎从容、不易屈服”的“界限”态度。康德、笛卡儿和黑格尔都是在从主体出发, 从大写的理性、逻各斯出发来认识自己和社会的, 陷入福柯所言的“我思哲学”^{[2]25}。而福柯的分析进路, 正是对被“英雄化”的“我思哲学”的解构。那么, 本文的核心关切, 正是回顾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历史的审视及其超越, 这对反思当代社会结构/秩序及其形成过程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亦可展示福柯思想中深刻的社会学意涵。

一、从作为酷刑对象的身体到“驯顺的肉体”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始, 福柯就比较了 19 世纪前后两种不同的惩罚方式。前者以惨烈为特征, 后者却变得比较“人道”了。也就是说, 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 既然(惩罚)对象不再是肉体, 那就必然是灵魂^{[3]17}。为什么灵魂成为新的惩罚对象? 福柯拒绝传统的解释, 即认为酷刑消失是人道主义兴起的结果。在福柯看来, 这显然不能解释

酷刑隐匿的真正原因。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种变化呢?

福柯讲到, 在 17 中期至 18 世纪末, 欧洲一些国家对一些重犯实施残酷的惩罚, 举行惩罚仪式, 以达到恢复君主受到伤害的“过剩权力”并达到“以儆效尤”之效果。福柯指出, 当时人的身体具有极为有限的劳动和商业价值, 人们对死亡、生命问题存在普遍的漠视态度, 相应的“人文科学”也没有形成, 因此, 身体并没有在学科和知识意义上得到系统地关注。而到 18 世纪末之后, 人们不再容忍酷刑仪式, 因为有的处罚有失公平, 并且手段过于残忍和血腥, 人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于是兴起了司法改革, 公开处决的仪式逐渐消失了; 惩罚的温和方式取而代之。这的确是一种“进步”, 因为人们对待犯人貌似更加人道了。而福柯认为, 人道主义是启蒙的一个副产品。启蒙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人道、进步观念渗透到了司法改革中; “改造人”而不是惩罚人成为目标。酷刑对惩罚犯人而言已经失效, 因为断头台的场面已经发生逆转, 犯人甚至成为绿林好汉, 受到赞扬, 而那些实施惩罚的刽子手等行刑人员却成为观众攻击的对象。因而, 对犯人的身体应该实施新的权力技术。

随着启蒙话语的广泛传播, 人的身体成为一个焦点, 成为一个需要谨慎研究的主题。展示罪行与折磨肉体不再重要, 而案件侦破的过程成为中心。普通人(观众)从复杂的案情侦破和惩罚中退出了,

收稿日期: 2009-02-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6CSH008); 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7420811)

作者简介: 刘海健(1982—), 男, 山东沂源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城乡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

取而代之的是法官、律师和精神病专家,这些“专家”关心的不是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本身,而是罪犯的肉体、他的历史、他的生活、他的特征。对这些做详细的“科学研究”,然后确定给予的惩罚。于是,关于犯罪的一系列“知识”形成了,其重点是改造犯人的灵魂,而不是对他的肉体本身进行残酷惩罚。福柯指出,司法、警察和监狱三者共同成为“过失犯”(“过失犯”在福柯的意义上指因恶劣环境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的人,也指屡教不改的习惯性犯罪者)的制造者,这正是现代监狱制度的效果³¹⁴。正因如此,福柯研究的是一种“效果史”,他探索的就是各种话语、制度、知识如何在历史中发挥塑造主体的作用的。

启蒙运动后,“应当如何生活”的应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理性甚嚣尘上,取代上帝的位置。人们的形而上追求仍旧盛行,只不过在启蒙之后的“逻各斯”成为科学、理性的进步观念。那么,在相应的司法话语体系中,人应该成为“守法”的人,跃出这个范围的人都因该受到相应学科知识体系的矫治。正如福柯所言,人的身体在司法、医学和精神病学上都成为焦点,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知识在不断形成,身体变得愈加重要了:为了改造、利用身体,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一整套“权力技术学”。

在惩罚的一系列“权力技术”中,针对人的身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原则,包括:最少原则、充分想象原则、侧面效果原则、绝对确定原则、共同真理原则、详尽规定原则³¹⁰⁴。总之,这是要把犯人的身体变的“规矩”,变得可以操作,变成一个具有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进步的、守法的、理性的人,而人们自觉自愿甚至欣喜地接受和推崇了这种规约。正如福柯在书中最后一章所指出标志着监狱诞生的事件:1840年1月22日,梅特莱农场(一个少年犯改造机构)的一个垂危的孩子说:“我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农场,太可惜了!”³¹⁸。那么,在一系列科学知识以及进步话语的“规训”之下,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现在的处境。在军队、学校、医院、工厂这些“全景敞视”的监狱群岛中,人们必须要合乎逻辑的行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举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都要符合“规则”。由此推而广之,监狱制度向整个社会蔓延,正常人的身体要负载应有的进步和理性观念。驯顺的肉体便是每一个“现代人”。这是一系列多么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运作!正如福柯所说的,如果这样按照一种既定的话语秩序,我们一样也可以说,正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正常”背后的玄机,推动惩罚方式变化或者监狱制度诞生,促使温顺肉体形成的力量就是启蒙

运动中孕育的现代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知识—权力关系。而要发现这种玄机,要运用有别于历史主义的谱系学方法。

二、剖析现代性主体的形成——权力谱系学

“驯顺的肉体”就是现代性处境下人被改造的身体。启蒙运动之后,理性、进步的话语俘虏了人们的观念,成为人们追求的至高价值。进而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为现代性的载体,这使得人成为现代性机器的零部件。上文已经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思想史,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确立并统治西方思想界的历史。然而在这些思想家之后,启蒙运动以前,上帝是人们思维逻辑的归宿;启蒙之后呢?理性和科学便成为人们生活的逻各斯,成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那么福柯追问的是,是谁规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崇高价值?为什么人们都臣服于它?在福柯看来,探寻其中的原因不是一个寻找线性规律、寻求“起源”的过程,而是探索当下社会的“出身”过程,是一系列的零碎的、充满断裂的、细致的和关注细节的谱系学工作⁴¹。

在福柯的意义上,谱系学的分析方法旨在从身体的视角来审视“现在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它要发现的是:各种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将个体视为劳动着的、说话的、生活着的主体是如何在权力—知识关系中被制造出来的;某种话语是如何被权力—知识关系在主体上产生并散播的。因此,谱系学的方法就是一种解剖术,一种对中心化力量(理性)的光谱分析,一部现代社会规训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史。这种源自尼采的分析策略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彻底批判。在福柯眼中,历史从来就没有必然性和一致性,不存在所谓的决定历史演进的中心化力量,那些被启蒙推崇的中心化力量是虚无的,历史是充满了偶然和断裂的。一切在历史角落中的残垣断壁和“边角料”都是认识我们社会何以成为当下状态的重要资源。通过对细节的把握和关注,把帝王将相的宏大历史背后的微观具体的故事呈现出来,从社会进化论和普遍发展的迷雾中走出来,这便是福柯发现现代性奥秘的方式,也便是体现于福柯后期著作中的谱系学方法。

通过谱系学的方法,福柯揭示了主体形成的历史细节。在该书的写作说明中,福柯讲到:“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

证明和规则 扩大了自己的效应 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3] 337}。谱系学方法的特点正在于去发现被掩饰的东西,它是在对局部言谈的描述基础之上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受压制的知识被解放出来,这些局部知识反对的是中心化力量导致的后果,中心化力量是社会中有组织的科学话语的制度与功能。正是中心化力量促成了主体的形成,而中心化力量正是在启蒙运动形成的,它借助于知识,在不断扩充自己的能量,使人们甘愿接受它的统治。

如果说康德在力图寻找人类理性化的先验基础并避免人类突破这个理性界限的话,那么福柯则以其谱系学分析破除这个先验基础,弄清楚主宰着理性实施的先天必然条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偶然的历史出身^[5]。福柯通过人类社会的一些诸如犯罪、疯癫、性等的局部体验领域来说明理性化过程的偶然和断裂的性质。如果按照社会进化论和进步观来反观历史,我们难以发现人作为主体的形成过程,或者我们根本就不会关心主体的形成,或者把这个过程视为理所当然,而循着谱系学的路径,我们便会发现在偶然和断裂的历史中孕育的现代性结果,从“熟悉”中发现“陌生”,从“简单”中寻找“复杂”;从“同一”中找到“差异”。主体就是在这种偶然和断裂的历史中形成的,但人们在启蒙的训导下却认为主体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合理的,而这实际上只是合乎理性的。追求理性的历史便是启蒙的讹诈史,是社会进化论的宏大叙事史。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人们顺理成章地“追求进步”;“无名者的生活”从不被写进历史,帝王将相主宰了历史的脉络^[6]。然而,通过谱系学,便可以发现无名者的真实生活,发现历史边角料中的无数不引人注目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可以让我们反思人类主体化的真正秘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看似在讨论监狱制度的诞生史,实际上他是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罪犯的身体应该被规训为现代性工程中的合格主体。罪犯所在的监狱的运作模式向整个社会展开,形成了“监狱群岛”,不同类型的主体形成了。这是个人向现代性的臣服,而这种臣服却是心甘情愿甚至浑然不觉的,在福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扩散的必然结果。人们“失去自我”,按照“正常的”模式去行动,去生活,想当然地接受社会建构,甚至基于此为自己设立“路标”,极少对自己生活进行“何以可能成为这样”的反思。

福柯以其谱系学方法分析了知识与权力的共

谋,进而展现人的现代处境的真正根源。启蒙话语的深入人心,使权力和知识相互支持,从而使人们甘愿臣服于现代性。在福柯的世界里,“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利益—冲突”和“权威—媒介”两种权力解析模式下的意涵,而具有更为一般的“力”的意涵。对福柯而言,权力并非一种被占有的实体,它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呈现自身的,权力并非一种压制性力量,恰恰相反,它具有积极的生产功能,它在生产着一个个可以利用的身体和社会结构^[7]。因为,知识是权力的载体,正是这两者的相互支持,使权力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使得人的身体顺理成章地被现代性铸造为合乎时宜的主体。启蒙以来,人的认识领域得到空前的扩展,理性精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人自己成为科学的对象。福柯认为,权力—知识关系造成了所谓“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关于人的各种知识在不断丰富,于是,人的主体化和对象化完成了。在福柯看来,主体化并非历史的必然,但又似乎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命运。而福柯努力的方向就是揭示这种将“现在”“英雄化”的历史真相。

三、超越主体化:何以可能?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主体化似乎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命运。启蒙、进步的话语是人类自然而然地接受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图景,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现代性的驯化,并浑然不觉地加固现代性的成果。在这里,福柯的确没有给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希望,也就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是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整体趋势与格局的。那么,个体就要完全臣服于现代性吗?对福柯而言,显然不是这样的。福柯对此的回答就是他的“自我技术”与生存美学。

在后期的著作《性经验史》第二、三卷中,针对人们的批评,福柯返回古希腊,反思性主体(伦理主体)是如何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8]。在福柯看来,创造主体性历史的方式,除了强制性实践在癫狂者与非癫狂者、病人与健康者、犯人与守法者之间作出二元划分,除了经验科学向活着的、讲着话的和劳动着的主体提供其位置外,还有第三种途径:对自身的关切、自身的技术和自身对自身的治理。古希腊人对性、对精神有着激情,并且有对激情的节制,这就是福柯所言的“关切自身”。那时候的哲学家们关注的是人如何把自我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处理。对权力的抵抗和瓦解是从自我出发的,赋予自身以独特的美感^{[2] 344}。这是一种自我伦理学,福柯关注的是伦理学而非道德,因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建构,是规则与禁

令。福柯从自身去寻找“解放”的路径,而不是通过社会建构,因此福柯对现代性的超越是通过自我的伦理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对抗和消灭中心化力量。这就是福柯的生存美学或者伦理学。福柯个人的生活,如同性恋、吸毒和自杀等虽然与其思想并不能直接对接,但也可以将其视为自我伦理的隐晦反映。当然,从福柯对古希腊思想的关注和理解来看,福柯的那些包括同性恋活动和自杀在内的所谓“终极体验”并不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福柯并不是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才去倡导关切自身的^[9],他在早年就关照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福柯对主体化的审视和超越就是对经典哲学命题回答方式的审视和超越。如果说韦伯对现代工具理性泛滥充满担忧的和悲观的话,福柯却并没有陷于绝望,而是以其关切自身的生存美学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态度。福柯对人类理性的建构历史进行了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对任何思潮都持谨慎、怀疑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关切自身的自我技术是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言的生产技术、交往技术和统治技术的,福柯认为,只有通过自我技术,才能在身体、心灵、思想和行为层面对人类的主体化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和相应的超越。

正如笔者开篇所言,福柯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贯穿着主体的问题。“福柯毕生都在探寻主体和真理游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主体是如何进入到真理游戏中去的^{[2]250}。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当人感到自己是疯子、病人,是活着的、讲着话的和劳动的人、犯罪的人和欲望之人的时候,人通过哪些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的存在?这个问题已经囊括了福柯的所有作品的关切。作为这个中心关切中的一段重要的道路《规训与惩罚》以监狱制度的诞生隐喻了规训社会的形成。在“权力—真理”的游戏中,主体化的过程在人的身体上实现了:健康的(相对于患病的)主体、正常的(相对于疯癫的)主体、守法的(相对于犯罪的)主体、道德(相对于不道德)主体……“毛细”权力无孔不入地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据此我们可以发现,福柯在这种“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进路中摆脱了先验性,始终以一种“界限态度”或“哲学的精神气质”来检视和批判各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不屈从于任何一方,冷静地审视现代社会主体的建构过程^[10],表现出一种“后结构主义”风格,蕴含了较强的“社会学意味”。

福柯在晚年提出的自我技术与生存美学则是福柯“逾越界限”的尝试,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说:“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

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做是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11]。因而,“生存美学”就具有反结构、“反社会学”的味道。正因如此,福柯实现了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 莫伟民. 莫伟民讲福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4] FOUCAULT M.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M]//Bouchard D F.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9-164.
- [5] 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6] 米歇尔·福柯. 无名者的生活[DB/OL]. (2008-11-20). [2007-11-02]. <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8173/>.
- [7]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6-43.
- [8]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7-359.
- [9] 詹姆斯·米勒. 福柯的生死爱欲[M]. 高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34.
- [10] 陆宏生,梁子浪. 从“生活世界”到“社会世界”:社会实在问题述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2):36-38.
- [11] FOUCAULT M. What is enlightenment?[M]//Rabinow P, Foucault M,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303.

